

比较职业教育研究的中国立场

郝天聪¹, 李小文²

(1. 南京师范大学 教育科学学院, 江苏 南京 210097;

2. 江苏师范大学 教育科学学院, 江苏 徐州 221116)

摘要:受西方中心主义立场影响,比较职业教育研究成果表现出价值取向西化、研究思维盲从、反思意识缺失等特征。从知识生产角度看,比较职业教育研究者习惯于用西方经典理论剪裁中国职业教育经验,认为中国只能贡献地方性知识,而无法生产具有普世意义的全球性知识。为提升比较职业教育研究学术水平,需要重塑比较职业教育研究的中国立场,培植对本土职业教育实践的文化认同感,彰显比较职业教育研究的民族性,构建中国特色的职业教育研究话语体系,创生引领世界职业教育研究潮流的中国范式。

关键词:比较职业教育研究;西方中心主义;中国立场

中图分类号:G710

文章编号:2096-6725(2023)06-0001-08

文献标志码:A

DOI:10.15903/j.cnki.jniit.2023.06.001

比较是人类认识世界的基本方法,当这种方法被系统地用来认识职业教育现象、揭示职业教育规律时,就形成了比较职业教育研究领域。比较法将不同时空的、看似距离遥远的不同研究对象、不同社会以及不同过程等等放在一起,让它们彼此碰撞^[1]。对比较职业教育研究而言,比较可以提供一种新的研究视角,帮助我们透彻地分析不同国家和地区职业教育办学实践的异同点,并为推进本土职业教育改革与发展提供借鉴思考。然而,当前比较职业教育研究领域呈现出较明显的西方中心主义倾向,甚至将国际化片面理解为西方化。在中国职业教育不断走向世界的过程中,我国比较职业教育研究如何在与西方的对话过程中坚守中国立场,有待深入探讨。

一、西方中心主义立场下比较职业教育研究的本土意识缺失

比较职业教育研究的重要目的在于融通不

同文化的职业教育传统,通过比较进行平等对话、交流,从而促进本土职业教育办学实践的改善。然而,现实中的比较职业教育研究并非如此,甚至长期存在西方中心主义的现象。

(一)西方中心主义的历史探源

西方中心主义通常被理解为西方通过自身的文化规范、习俗和标准来看待世界并对其进行评估的倾向^[2]。比较职业教育研究在本质上属于社会科学研究的范畴,而社会科学建制的历史通常以西方为中心。现代社会科学起源于19世纪的欧洲,法国大革命之后,欧洲社会被政治冲突、城市化和社会动荡所震撼^[3]。彼时,欧洲社会的自然科学研究蒸蒸日上,其研究方法受到推崇,特别强调以科学的研究范式探究事物发展的规律与原则,从而加强人类掌控自然的力量。在混沌动荡的社会中,这种研究倾向也被带入到社会科学研究之中。孔德等知识分子试图从剧变的社会生活中找到与牛顿物理学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教育学一般课题“职业发展视角下高职院校教师企业精准实践研究”(编号:BJA220244)。

作者简介:郝天聪(1989—),男,山东汶上人,南京师范大学副教授,教育学博士,研究方向:比较职业教育、职业教育政策。

相似的法则,以期解释令人困惑的社会谜团,寻找新的出路。当时的社会科学研究正是为了应对欧洲社会问题而产生的,不可否认这是一种革命性的进步,大大推动了欧洲的现代化进程。而后,随着现代化进程的推进,西方中心主义思想逐步凸显,成为欧洲精英谋求社会利益的一套独特而有力的信念,并为其思想提供了学理基础^[4]。随着欧洲殖民力量的扩张,这种西方中心主义的思想逐渐渗透到非西方社会结构之中,成为“现代”与“发达”文明的代名词。然而,需要强调的是,社会科学与人文科学不同,其研究深深根植于特定时期、特定背景与特定文化情境之中,研究结论对于其他社会形态是否同样适用不能一概而论,其解释力也会随着时间与空间的变化而发生相应变化。遗憾的是,西方中心主义立场对社会科学研究各领域带来严重冲击,在包括比较职业教育研究在内的现代社会科学研究中广泛存在并长期盛行。

从认识论角度来看,随着时间和空间的巨大变化,不少原有的西方理论已经无法解释特定国家的社会现实,尤其是发生在非西方社会的种种现象。然而,西方主流社会科学界在很大程度上选择对这些新变化视而不见。而这种“不作为”甚至演化为一种激励信号,激发更多的,尤其是非西方社会的研究者更为狂热地搜集、挖掘西方社会科学研究成果与社会经验,试图去不断地验证或应用西方理论,而不是从本土渊源和本土实践出发去找寻问题的关键所在。西方中心主义不仅在西方世界得到崇尚与彰显,甚至可以超越自身文化特殊性而彰显于非西方社会。

(二)西方中心主义在比较职业教育研究领域的蔓延

从本义来看,全球化的目的在于推动比较职业教育研究领域的繁荣,尊重不同文化传统、坚持多元立场是实现彼此平等对话的基本前提。然而,就现实而言,由于在职业教育实践层面落后于西方,不少学者在开展比较职业教育研究时仍会不自觉地陷入西方中心主义立场,并受到其学术话语体系的支配。比较职业教育

研究是一种国际性的活动,西方中心主义立场势必会产生负面影响,使得比较职业教育研究领域失去多样化发展基础。

1. 价值取向的西化

目的是与价值紧密联系在一起,目的的提出往往与研究者的价值取向密切相关。作为一种目的性较强的研究实践活动,比较职业教育研究从选题到设计再到实施,各个环节都隐含着研究者的价值取向。就此而言,不少比较职业教育研究领域成果在价值取向方面将国际化等同于西方化,呈现出较为明显的西方中心主义立场。在这种立场下,不少学者更愿意在SSCI数据库收录的国际期刊上发表论文,而不愿意将最前沿的研究成果发表在中文期刊上。大量比较职业教育研究者及其研究成果缺乏对本土文化的基本认知与尊重,并夹杂着对西方职业教育办学实践近乎偏执的模仿与照搬,从而导致价值取向的全盘西化。这样的价值取向已经超出了学术立场的范畴,更暗藏了一种隐蔽的政治立场,代表着丧失主体意识的自我矮化^[5]。当越来越多的学者寻求将西方中心主义作为价值取向之时,将会在很大程度上忽视对本土职业教育实践的关注以及本土职业教育理论的创新,在不断为西方经典理论做注脚的过程中迷失自我,甚至出现“问题在域外、解释在域内”的尴尬境地。

2. 研究思维的盲从

除价值取向外,西方中心主义立场也塑造着比较职业教育研究者的思维方式,典型特征是研究者逐渐失去对本土职业教育实践的敏感性。在西方中心主义立场下,西方职业教育理论与实践具有先天的优越性,而对这种优越性的信奉容易使研究者陷入盲从,意识不到可能存在的不足与缺陷。对此,有学者提醒,过往的许多比较职业教育研究预设某国在职业教育领域的实践是先进的、更高水平的,值得我们借鉴和学习,但即使发达如北欧,其职业教育实践与改革也会面临一些困境和挑战,且他们与我国职业教育实践所面临的一些挑战有类似之处,也许其背后可以反映出职业教育发展的一般规

律^[6]。尽管有部分研究开始尝试突破西方中心主义的研究思维,从更为客观的本土化视角探究西方国家职业教育办学经验,但总体上来看,这种研究思维的彻底转变仍旧要经历一个漫长的过程。

3. 反思意识的缺失

反思意识是比较职业教育研究科学性的重要保证,对于整个研究过程至关重要。无论是问题的提出,还是研究设计,抑或研究发现的撰写,实际上都需要研究者具备反思意识,并在不断反思的基础上优化研究。然而,在比较职业教育研究中,这一环节仍然比较薄弱。米尔斯提出的“抽象经验主义”概念可以为解释这一现象提供一定参考。所谓抽象经验主义,是指社会学研究中存在的从自身目的出发大量收集数据,却无法建立一个能够赋予这些数据以意义和价值的理论框架的现象^[7]。在比较职业教育研究领域,抽象经验主义往往表现为,研究者倾向于将西方经典概念、理论框架等奉为圭臬,并直接以此为依据搜集与分析本土数据,进而得出研究发现,而不去反思西方经典概念、理论框架的适用范围、应用空间与局限性。诸如此类的研究表面上遵循了国际研究范式,并致力于为国际职业教育研究理论做知识贡献,但由于未能触碰到本土职业教育实践的核心问题,往往很难实现真正的重大理论创新。在此意义上,与其说研究者在进行比较职业教育研究时缺乏一定的反思能力,不如说在本质上缺乏基本的反思意识。

二、西方中心主义立场下中国职业教育知识生产角色的争议

长期以来,比较职业教育研究者往往会不自觉地中国的职业教育研究等同于经验,而将西方的职业教育研究等同于理论,似乎中国职业教育研究只能贡献地方性知识,而无法生产具有普世意义的全球性知识。如果将西方理论作为绝对衡量标准,比较职业教育研究者就会下意识地将中国职业教育实践视为病态或残缺形态,从而陷入不平等的对话之中。从比较

职业教育研究的功能和目的来看,这种观点有失偏颇。

(一) 基于主体间性关系视角的分析

就主客体关系而言,可将研究者定义为比较职业教育研究的主体,将职业教育发展事实定义为比较职业教育研究的客体。而在进行具体的比较职业教育研究时,由于研究者所处国别不同,又可将本国职业教育发展事实定义为内容体,将他国职业教育发展事实定义为外客体。需要指出的是,此处所讲的事实本质上为主体对现实的反映。正是这种内外客体之间的差异为比较职业教育研究提供了必要条件,也为不同国家职业教育办学实践的交流与对话提供了可能性。当然,内外客体之间的交流与对话是以主体的介入为基本前提的。在这一过程中,如果一方对另外一方形成压倒性优势,那么就有可能带来双方之间交流与对话的不平等。中西方职业教育会陷入不平等的交流与对话,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西方职业教育研究者的优越心态,以及本土比较职业教育研究者的弱势心理。由于受到西方中心主义思想的影响,非西方研究者往往会不自觉地将西方职业教育发展事实置于上位,而将本土职业教育发展事实置于下位,实际上隐含了一种不平等的关系立场,正是这种立场的存在导致双方无法实现平等交流与对话。

究其根源,作为职业教育的后发国家,中国职业教育在办学实践上相比西方国家长期存在各方面的不足,这也影响到中国比较职业教育研究者的主体意识,甚至造成中西方比较职业教育研究者主体间性关系的失衡。对于学术研究而言,比“主体性”更为重要的是“主体间性”,这是因为自我的发现往往是在与他者进行比较的过程之中得到的^[8]。拥有良性生态的主体间性关系强调主体之间具有平等的关系,虽然存在发展阶段的差异,但这种差异并不能成为强势一方对弱势一方实施文化霸权的理由。长此以往,受不平等主体间性关系的影响,研究者在进行比较职业教育研究时,往往以西方职业教育比中国职业教育发达的认知为前提,在分析

外客体职业教育事实时致力于分析其成功的一面,较少分析甚至忽略其失败的一面。并且,在没有经过系统比较与深刻反思的基础上,仓促提出西方国家职业教育发展经验对我国的启示,实质是对自身主体性的让渡。

(二)基于理论与经验关系视角的分析

尽管不同国家在职业教育制度安排、办学思想、组织形式等方面存在一定差异,但一般性的职业教育发展规律是存在的,对于这一规律的探索过程也是职业教育理论生成的过程。对于比较职业教育研究而言,经典理论一定是具有实践关怀的,缺乏实践基础的理论很有可能由于虚假概念的堆砌而成为“空中楼阁”。而且,理论的生成并没有国界之分,基于本国或他国职业教育办学经验提出具有生命力、解释力的职业教育理论,是比较职业教育研究者的使命所在。在比较职业教育研究中,中国学者的研究同样要将理论的生成作为重要价值取向,这是与西方职业教育实现理论对话的基本前提。比较职业教育研究者不能简单地将理论创新视为西方学者的任务,而将经验解释视为中国学者的任务。这意味着,在进行比较职业教育研究时,不能一味地用西方职业教育经典理论裁剪中国职业教育实践经验,而是要将西方视为经验上的他者。

然而,这一朴素想法在现实的比较职业教育研究中却很难得到验证,甚至出现“学术殖民主义”的现象。其主要表现形式是过分强调西方经典职业教育理论的神圣性,不将本土职业教育理论的生成作为研究目的,而是片面强调借助西方经典理论解释中国复杂的职业教育实践,其本质是为西方提供一个了解中国职业教育实践的窗口。在传统的西方中心主义话语背景下,比较职业教育研究往往会产生一种分工,即中国学者提供本土经验的案例与数据为西方经典理论体系做“注脚”,西方学者在此基础上对来自中国的经验材料做进一步加工,并上升到抽象理论的高度,进而以此继续指导中国职业教育的办学实践,并循环往复。如此一来,中国比较职业教育研究者容易陷入“拿来主义”的

思维定式,频繁使用西方的研究概念、分析框架等,较少主动产出具有原创性的理论知识,更多扮演理论应用者而非生产者的角色。需要注意的是,以削足适履的方式用西方职业教育理论裁剪中国职业教育办学实践经验固然存在不妥,但也不能一味地以中国主位为理由拒绝中西方理论对话。如此一来,很容易陷入矫枉过正的局面。

(三)基于特殊性与普世性关系视角的分析

回顾当下的比较职业教育研究成果,需要反思的问题是:所谓西方职业教育的经典理论是否真正具有跨越国界、适用于其他社会和国家的普世性价值?而中国职业教育办学实践的特殊性又是否会在与西方职业教育理论的对话中被遮蔽?亦即,我们应该如何看待比较职业教育研究中特殊性与普世性之间的复杂关系,以及如何看待地方性知识和全球性知识生产的使命?对于比较职业教育研究者而言,应该更多地从自身问题而不是他人问题出发,寻找有价值的研究课题,并通过规范的研究设计与资料分析,找到可能的问题解决方法与对策。当然,这种问题的提出可能与个人经验密切相关,甚至带有较强的地方文化色彩,展现出一定程度的特殊性,但这种特殊性的存在并不意味着对普世性的忽视。比较职业教育研究者要做的是,超越自身狭隘的认识,抛弃自我的偏见,尽可能地以开放的心态融入国际职业教育交流中,并为促进职业教育研究领域理论知识体系的完善做出贡献。

相对而言,具有特殊性的地方性知识存在一定局限性,其适用情境往往较为有限;具有普世性特征的全球性知识生产以实在性事实为基础,其生产过程往往要经历较为复杂的比较与反复思量。遗憾的是,长期以来,受西方中心主义立场的影响,中国比较职业教育研究者更习惯于从西方借鉴学习具有普世性价值的理论与经验。新中国成立之后,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为提升职业教育办学水平,不少地区探索将德国、英国、澳大利亚等国家的职业教育办学模式引入中国,甚至在学习西方职业教育办学经验的道路上陷入路径依赖之中。这种实践层面的

落后局面一定程度地影响着比较职业教育研究者的学术立场,导致他们对于生产具有普世性价值的本土理论缺乏信心,而更愿意扮演生产地方性知识的角色。事实上,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职业教育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并逐渐形成职业教育发展的中国经验,为推动国内经济社会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9]。伴随着“一带一路”倡议的实施,中国职业教育办学模式也推广到“一带一路”沿线不少发展中国家和地区。中国的比较职业教育研究者需要拥有更多的理论自信,并自觉承担起为世界职业教育生产全球性知识的重任。

三、走向世界的中国比较职业教育研究

在当今世界,全球化已然渗透到教育的各个领域,不同国家之间的职业教育交流也更加频繁。随着网络技术的不断进步、研究工具的日益完善,研究者可以更为便捷地从他国获取所需要的资料,前往对象国进行实地考察也比以往更加便利。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比较职业教育研究者的使命不再是单纯意义上对国外职业教育办学经验的简单介绍,而是努力将“论文写在中国大地上”,将中国立场贯穿于整个研究过程之中。当然,这种对中国立场的坚持并非排斥世界,更多的是为世界职业教育理论与实践领域发展做出中国贡献。

(一)培植对本土职业教育实践的文化认同感

由于起步较早,西方国家在职业教育实践领域已经形成一定的先发优势,并将其实践经验不断传递到以中国为代表的后发国家之中。但这种先发优势并不是绝对的,而且其发展经验不可能适用于所有国家,盲目照搬只会带来“南橘北枳”的问题,这是比较职业教育研究中应该具有的基本常识与判断。中国比较职业教育研究水平的提升有赖于对本土职业教育实践的深刻体悟,更重要的是培育对本土职业教育实践的文化认同感。

就具体路径而言,一方面,要培育对本土职业教育实践的文化自觉。文化自觉是费孝通于

1997年提出的概念,指对本民族文化的自我觉醒、自我反思和理性审视,即生活在一定文化历史圈子中的主体对自己的文化应该有自知之明,既清楚长处,也了解短处,同时也要了解和认识其他文化,处理好本土文化与外来文化之间的关系^[10]。费孝通所提出的“差序格局”正是基于对本土文化的自觉,并在与西方“团体格局”比较过程中产生的概念。对比较职业教育研究者而言,这种文化自觉意味着从个人熟悉的经验出发,探讨中国职业教育办学实践中的真问题,并站在世界性的高度审视这一问题的重要性。此处所讲的世界性并非浮于表面的对空洞的乌托邦的追求,而是扎根于大地之上的对美好世界的现实憧憬。即便是对世界职业教育发展实践的观察,也需要以具有地方色彩的本土经验为起点,批判性地分析其对于中国职业教育办学实践的可借鉴之处以及不可借鉴之处。

另一方面,要培育对本土职业教育实践的文化自信。文化自信实际上是对文化自觉的进一步深化,即将本文化与异文化之间的区别更多地看作是一种差异,而非简单意义上的差距。面对全球化的大潮尤其是西方文化的侵袭,民族文化理应在碰撞中守望优秀传统文化,在多元中彰显自身的个性与特色,实现文化自信^[11]。这种文化自信意味着比较职业教育研究者既不能妄自菲薄,也不能妄自尊大,要客观地总结职业教育办学实践的成功之道,而不是将国别作为影响职业教育成功办学实践的唯一变量。这提醒我们,在具体研究过程中要抛弃对西方文化的盲目崇拜,客观地分析其职业教育成功办学实践的生发机制,不在西方经典理论框架下对中国职业教育办学经验进行剪裁,而是扎根于本土职业教育实践,致力于生产具有全球性特征的职业教育理论知识。

(二)彰显比较职业教育研究的民族性

以往,比较职业教育研究在介绍国外职业教育发展动态、服务政府职业教育决策咨询等方面做出了重要贡献。但是,比较职业教育研究者不仅要“向外看”,而且要“向内看”,通过深入了解世界各国职业教育发展的实际状况,服

务我国职业教育发展实践,为解决中国职业教育问题提供指导方案。如果未对本国职业教育实际情况加以分析,单纯探讨国外的职业教育办学经验,必然会造成比较职业教育研究与本土职业教育发展实践的脱节。如此一来,不仅很难生成具有生命力的职业教育理论知识,而且其研究成果很难真正指导职业教育办学实践。为扭转这一不利局面,需要在比较职业教育研究中进一步彰显民族性。

一般而言,民族性是指本民族特有的行为方式、思维方式等,是其区别于外来民族的外显特征的集合。具体到比较职业教育研究中,就是使研究成果根植于本民族的职业教育实践土壤。其中,最为关键的一环就是能够直面中国职业教育实践,提出贴近本民族实际、彰显本民族特色、推动本民族发展的本土化职业教育问题,并在此基础上展开国际比较研究。问题提出的基本方法是深度挖掘职业教育发展的事实,反思问题与个人经验和知识背后所蕴含的民族精神内涵,探索在中国语境下职业教育研究者才能感受到的内隐观念、法则和规范等,并在回顾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进一步明确研究问题。而后,通过比较研究方法的运用,探讨造成不同国家职业教育办学实践差异的关键影响因素,并探讨可能的解决路径。当然,比较职业教育研究并不直接指向现实问题的解决,而是致力于为解决现实问题提供实证依据,其最终结果也并非指向现实行动,而是为引导现实发展提供新的思想、认识或解释等。

由此,当我们冲破禁锢思想的西方中心主义立场的影响时,以平等姿态寻求中西方职业教育之间的对话,不仅可以促进本土职业教育理论知识的生产和实践经验的积累,而且可以为世界职业教育办学规律的不断完善贡献中国智慧。

(三) 构建中国特色的职业教育研究话语体系

在全球化时代,不同国家职业教育之间的互动已不可避免,该互动的理想形态是取长补短、彼此互鉴。如学者所言,发展出一套以反映

不同文明、尊重多元文化为特征的思想在人类历史上第一次变得真正可能,这将对消除文明冲突大有裨益^[12]。然而,就现实情况来看,比较职业教育研究者往往将西方职业教育办学实践优于我国作为假定前提,导致研究成果具有明显的西方中心主义色彩,即便文章使用的语言为中文,但理论和思路却常常来自西方,忽视本土职业教育研究话语体系的构建。

为进一步提升我国比较职业教育研究的学术水平,我们需要的不仅是对西方话语体系的借鉴与吸收,更重要的是在与西方话语体系对话过程中,基于对本土职业教育实践的深刻体悟,生成具有本土特色的职业教育研究话语体系,着力挖掘话语体系的中国风格与中国气派。具体要做到以下三点:一是在全球化背景下,中国比较职业教育研究不仅要为世界提供中国经验,而且要致力于在职业教育知识创新方面做出理论贡献;二是要进一步梳理比较职业教育研究与广泛意义上的社会科学研究之间的关系,加强不同学科之间的跨界合作,并从其他学科话语体系中汲取营养;三是要善于回到自身的文化传统,从中国文化传统出发解释职业教育实践中的各种现象,在继承传统中不断开拓创新,生成具有较强解释力的本土概念,并积极寻求与其他国家在相关发展议题上的平等对话,努力在国际交流舞台上讲好中国故事。

(四) 创生引领世界职业教育研究潮流的中国范式

长期以来,不少比较职业教育研究者满足于对西方职业教育办学的经验范式介绍,直接套用西方职业教育理论的现象仍较为普遍。虽然比较职业教育研究的理论工具应用比以往更为广泛,但缺乏批判意识的借鉴只能使相关研究成果流于形式,未能有效形成职业教育研究的中国范式。为进一步彰显比较职业教育研究的中国立场,推动中国职业教育研究走向世界,需要从唯西方中心主义的“照着讲”走向以中国为中心的“对着讲”,努力做到“洋为中用”而非“西体中用”,避免将中国经验知识变成对西方理论体系的地方性解释。比较职业教育研究者

要在此过程中思考中国式职业教育现代化实现的可能性,并努力探索创生引领世界潮流的中国职业教育研究范式。

具体而言,中国职业教育研究范式的创生要在以下几个方面着力突破。一是提升中国职业教育研究的高度。与西方相比,政府在中国职业教育发展过程中扮演着更为重要的角色,职业教育发展路径往往受到相关政策的约束。因此,提炼中国职业教育研究范式,需要充分关注职业教育政策前沿与要义,把握中国职业教育发展的方向与方位。二是提升中国职业教育研究的深度。在漫长的发展过程中,中国职业教育总结出了一系列的经验,也出现了一系列的问题。提炼中国职业教育研究范式,要深深扎根于职业教育办学实践,总结其中蕴含的规律性特征,探讨影响职业教育办学的根本性问题。三是提升中国职业教育研究的广度。无论是从职业教育办学实践出发,还是从职业教育基本原理出发,都会涉及一系列的议题,包括课程、教学、教师、教材、评价等。提炼中国职业教育研究范式,需要尊重职业教育办学的多样化特征,并在不同领域形成鲜明的研究风格。

当然,创生引领世界职业教育研究潮流的中国范式,并非走向另一种极端的民族中心主义,而是以民族之眼洞察本国职业教育发展事实,以更开放的姿态寻求与其他文化传统的交流与对话,努力融入职业教育发展的全球化格

局之中,使世界了解我们,并为世界职业教育的理论与实践创新贡献中国力量。

参考文献:

- [1] 奥利维耶·雷穆,让·弗雷德里克·肖布,伊莎白·蒂罗. 社会科学研究比较法[M]. 王晓瑞,译.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19: 1.
- [2] [4] 杨锐,叶薇. 百孔千疮: 当代比较和国际教育研究方法论批判[J]. 比较教育研究, 2019(3): 68-77.
- [3] WALLERSTEIN I. Eurocentrism and Its Avatars: The Dilemmas of Social Science [J]. New Left Review, 1997(226): 93-107.
- [5] [8] 熊易寒. 中国社会科学国际化与母语写作[J]. 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4(4): 116-123.
- [6] 李俊,穆生华. 职业教育公共政策的两难困境——北欧职业教育的现状、改革与启示[J]. 高等工程教育研究, 2021(3): 133-139.
- [7] MILLS C W. The Sociological Imagination [M].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59: 3-58.
- [9] 郝天聪. 服务“一带一路”建设的中国职业教育: 经验与挑战[J]. 教育发展研究, 2017(17): 62-68.
- [10] 张友谊. 从文化自觉到文化自信[N]. 光明日报, 2017-11-29(11).
- [11] 李政涛. 文化自觉、语言自觉与“中国教育学”的发展[J]. 华东师范大学学报(教育科学版), 2010(2): 9-16.
- [12] GUNDARA J S. Global and Civilizational Knowledge: Eurocentrism, Intercultural Education and Civic Engagements [J]. Intercultural Education, 2014(2): 114-127.

China's Position in Comparative Vocational Education Research

HAO Tiancong¹, LI Xiaowen²

(1. Nanjing Normal University, Nanjing 210097, China;

2. Jiangsu Normal University, Xuzhou 221116, China)

Abstract: Influenced by the position of Western centrism, the research results of comparative vocational education show the characteristics of Westernization of value orientation, blind obedience of research thinking, lack of reflection consciousness and so on.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knowledge production, comparative vocational education researchers are used to tailoring China's vocational education experience with Western classical theories, and believe that China can only contribute local knowledge, but cannot produce global knowledge with universal significance. In order to improve the academic level of comparative vocational

education research, it is necessary to reshape the Chinese position of comparative vocational education research, cultivate the cultural identity of local vocational education practice, highlight the nationality of comparative vocational education research, build a discourse system of vocational education research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and build the Chinese paradigm leading the world trend of vocational education research.

Key words: comparative vocational education research; western centralism; China's position

(责任编辑:葛薇)

《江苏高职教育》2024年投稿指南

《江苏高职教育》(CN32-1886/G4、ISSN2096-6725)由江苏省教育厅主管、南京工业职业技术学院主办,原名为《南京工业职业技术学院学报》,为AMI(职院刊)扩展期刊、江苏省一级期刊、CNKI中国期刊全文数据库收录期刊、《万方数据—数字化期刊群》上网期刊、中国核心期刊(遴选)数据库收录期刊、中国学术期刊综合评价数据库统计源期刊、国家哲学社会科学学术期刊数据库和国家哲学社会科学文献中心收录期刊。《江苏高职教育》坚持立足江苏、面向全国,跟踪国内外高职教育改革的热点、难点,反映职业本科教育理论、高职教育理论、高职教育评价、教育教学改革、职业教育比较以及高职教育实践等相关领域前沿研究成果,促进研究成果转化、应用和推广,打造职业教育学术交流阵地,提高期刊学术水准和社会影响力,服务我国职业教育事业发展。

本刊设有“高职教育理论”“职业本科教育”“黄炎培职教思想”“评价与比较”“职业教育与区域经济”“职业教育与创新创业”“高职教学技术”“高职教育管理”等栏目。为进一步提高本刊质量,诚挚欢迎广大作者惠赐富有创新性、学理性、实践性的佳作,尤其期盼关注职业教育前沿问题的精品力作。

一、投稿方式

1. 请登录《江苏高职教育》官网(<http://jsgzjy.niit.edu.cn>),进入投稿系统投稿。

2. 投稿完成后,作者可登录投稿系统或关注微信公众号“江苏高职教育”查询稿件处理进度。从收稿之日起2个月为审稿期,稿件如被录用,我刊编辑部及时通知作者。凡投稿2个月内未收到录用通知的,作者可自行处理。

二、相关规范

1. 标题。论文的标题要求简洁、精练、准确,可加副标题;英文标题、关键词、摘要请附在文末。

2. 作者信息。来稿作者请将本人的相关信息附在文末,包括真实姓名、出生年月、性别、籍贯、工作单位、职务、职称、最高学位、研究方向,以及通讯地址、邮编、电话号码、电子邮箱。

3. 摘要和关键词。摘要以200—300个汉字为宜,应用第三人称对文中观点、措施等进行归纳概括,力求精炼准确,避免出现“本文”“论文”“作者”或“本研究”等主观词汇及“认为”“指出”等词语;中文关键词3—5个,须反映文章主要内容。

4. 基金项目。若有基金资助或课题经费资助的论文,请在[作者简介]后用[基金项目]注明基金项目名称或课题项目名称及编号。

5. 正文。6000字以上为宜,来稿应使用规范的汉字和标点符号;数字书写和插图、表格的编排应符合有关的国家标准和规范。

6. 参考文献。稿件参考文献著录应符合国家标准GB/T7714—2015的相关规定,文献序号按其出现在文中的顺序排列,并在文中以上标形式标注,重复引用的以第一次出现的序号为准。

三、特别声明

1. 论文正式发表后,我刊将寄送给作者2本样刊,并支付稿酬。

2. 《江苏高职教育》官网(<http://jsgzjy.niit.edu.cn>)是本刊唯一官方网站,本刊从未授权任何机构和个人代理组稿,也不对作者收取任何费用。

3. 文稿需遵守国家相关的法律法规、标准以及学术道德规范,严禁一稿多投及抄袭、剽窃等行为。

4. 文稿一经作者同意采用,编辑部有权对来稿作文字性修改,有权将其作者著作权(含复制权、发行权、汇编权、翻译权以及网络信息传播权等)转授给第三方使用。

联系电话:025-85864244 联系人:葛薇